

XUEZHE CANGSHU YU
XUESHU YANJIU DE ZHUANXING
YI ZHENG ZHENDUO WEI LI

学者藏书
与 学术研究的转型
——以郑振铎为例

李俊◎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学者藏书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以晚清民国为中心”成果之一

本书出版获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博士专项课题的立项资助

学者藏书 与学术研究的转型 ——以郑振铎为例

李俊◎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装帧设计:陈 爽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者藏书与学术研究的转型:以郑振铎为例 / 李俊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676-1202-0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郑振铎(1898~1958) — 人物研究②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799号

XUEZHE CANGSHU YU XUESHU YANJIU DE ZHUANXING YI ZHENG ZHENDUO WEI LI

学者藏书与学术研究的转型——以郑振铎为例

李 俊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0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202-0

定 价:24.5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治学经历与藏书之关系	4
第一节 早期治学经历与兴趣	4
第二节 学者式藏书活动与收获	11
第二章 藏书理念与藏书特色	23
第一节 藏书收集与整理	23
第二节 藏书目录与题跋	42
第三节 藏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60
第三章 学术成就与藏书之关系——以文学史研究为例	69
第一节 叙述模式与文学史观念	70
第二节 文学史分期与新经典的确立	84
第四章 学术成就与藏书之关系——以戏曲小说研究为例	98
第一节 古代戏曲小说搜辑与史料整理	98
第二节 戏曲小说研究与方法创新	114
第三节 戏曲小说史与20世纪研究格局	134
第五章 以藏书为基础的跨领域研究与开拓	152
第一节 “变文”研究	153
第二节 诸宫调、宝卷、弹词研究	159
第三节 民间故事研究	164
第四节 词曲研究	167
结 语	172
附 录 郑振铎研究主要资料一览	183

绪 论

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上半叶是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现代研究范式真正确立的时期,研究者已试图从“史学史”“研究史”角度描述这一转型过程,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国文学史学史》《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及《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等。但截至目前,尚无研究者对藏书活动与文学研究格局形成之间的关系展开相关论述。

本书选择郑振铎作为考察对象,试图通过郑振铎作为学者的藏书活动与他的文学研究成就之间的关系,从他的治学特点与藏书的关系、藏书特色对治学成果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和学界地位与他藏书的关系等方面,探索学者藏书在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作用。同时,本书试图透过书籍聚散情况,剖析文学的观念、内容、材料、方法等向现代研究模式发生转变的文献基础与转型路径。

郑振铎,小名木官,笔名西谛、郭源新等。福建长乐人,1898年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是20世纪我国著名学者、作家、编辑。其治学范围涉及中外文学史、艺术史、版本目录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作品现存逾千万字,以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全集》搜罗最为完备。《郑振铎全集》共20卷,计900余万字,尚不包括《西谛书跋》及许多已发表但未收录或未发表而未整理的材料^①。据统计,郑振铎一生著述之丰令人咋舌:创作计18种,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书简、日记等。中国文学论著9种,世界文学论著5种,艺术史论著7种,目录学论著6种,翻译作品25种。此外,他还编辑过报纸期刊45种,主持出版丛书29种,影印古籍19种,编选出版图录17种,编校中国文学及

^① 如1921至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尚有数万字署名为西谛或振铎的文字未曾收入。另如郑振铎1949、1953、1954、1956、1957、1958年的日记收入了《郑振铎日记全编》中,却未见载于《郑振铎全集》。详见拙文《评花山文艺版〈郑振铎全集〉》,《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2期。

外国文学书29种。

郑振铎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独特意义,更多地在于文化层面。他生活在中西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汇并深刻影响学术研究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学者,一方面身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在接触西方观念后清楚地看到了传统学术的弊端,因此无论是文献利用还是研究观念都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抉择。时代赋予他们重建学术传统的机会,同时使他们迫切地感受到如何为传统文化寻找确切定位的焦虑。他们译介引入西方理论,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力图为传统学术开辟新的领域。他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正是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艰难摸索的体现。绵延至今并成为新的传统的现代性学术研究范式,正是经过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先行者的尝试,鲁迅、胡适等“五四”一代学者的鼓吹与身体力行,到郑振铎、朱自清、闻一多、钱锺书这一代才真正得以确立。

本书立足于学者藏书与研究转型之间的关系探索,以郑振铎这一“文化学者”为例,因其兼具学者藏书家与“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治学特点,故本书重点探讨其在藏书活动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与典范意义。本书试图通过分析郑振铎学术研究的理论渊源、文献基础、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来勾勒学者藏书活动介入研究领域带来的研究材料、方法与成果的深刻变化,并藉学者之间治学方式、内容、成就与影响的横向比较,为他“学者藏书家”身份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间的价值与意义定位一个独特而恰当的学术史坐标。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小引”中说过:“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然立足于个案分析,可着眼的是学术思潮的变迁。”^①同样,以郑振铎为切入点去关注此一时期的学者藏书家在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与方法总结,而是要透过郑振铎这一典型个案,为古典文学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新变与定型进行学术史解析。有一种研究思路是从“新异”变成传统,这是一个众多学者参与并代代传承的过程,解析他们独具个性的学术之路,正是为解析新传统如何形成并还原一道清晰的学术脉络,其成功与不足都是值得我们后来者借鉴的宝贵经验。因此,本书主要

^① 陈平原:《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1. 社会学、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民国学人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与学术环境下进行研究的,本书将在还原民国时的学术语境的基础上,力求不遮蔽,以历史、社会、发展的观念客观展示郑振铎一生的学术成就,也不讳言其转型过程中的不足。

2. 综合、对比的研究方法。本书属个案研究,又属研究者的研究,然着眼点在于通过对郑振铎个人治学道路的描述及得失分析,来回望中国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学术思潮的变迁,为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提供准确具体的个人定位。在具体研究郑振铎的学术成就时主要通过同时代学人的治学理念与成果进行对比,从对比中为他在纵向时空中找到确切定位。

3. 版本对照与文献考据法。由于郑振铎的所有研究论著(包括其文学史)都是先行发表于杂志的,郑振铎在世之时在收入文集时即已作过删改,这种删改有时并非出于校订文字或补充结论,因此,要全面把握郑振铎一生学术思想的变迁,就必须对照不同时期的版本(包括最初发表的杂志),从而归纳出他不同时期学术取向的变化与研究思路的创新。

第一章 治学经历与藏书之关系

周勋初先生曾在《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中言：“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出现过一批杰出的学者，他们并非出生儒学世家，本人在学界起步时也并非专注于古代文学，但随着时代潮流的激荡，转而是由其他领域闯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随后由一个课题转入另一个课题，纵横驰骋，不断开拓新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①这其中，王国维是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然并非唯一，举凡闻一多、郑振铎、朱东润、郭沫若、罗根泽、吴世昌等，都可入此之列。他们由新入旧，引入了新的视角、方法和观念，在旧学中结出了新的果实。

第一节 早期治学经历与兴趣

一、《小说月报》：早期藏书交流与研究的主要阵地

郑振铎虽非科班出身，然其编辑成就足以让他名列20世纪最出色的编辑之一。据统计，郑振铎编辑过的报纸期刊达45种^②，内中不乏在民国时期影响颇广的刊物，如《学灯》《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儿童世界》《文学》等。在1923年1月郑振铎接下《小说月报》主编前，他编辑过《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文学周报》（后来改为《文学旬刊》）。截止到1927年他因“白色恐怖”被迫流亡欧洲的四年间，他一直担任《小说月报》的全职编辑，与此前矛盾的编辑方针相比，郑振铎更注重将其打造成新文学建设与旧文学研究并重的文学刊物，而非仅仅满足于翻译介绍国外名家作品。于是，依托《小说月报》这个媒体平

^① 周勋初：《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周勋初文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② 此据陈福康《郑振铎年谱·附录二》统计，《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

台,郑振铎在全职编辑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着手他的古典文学研究。说他“业余”,不仅就其学术背景与工作时间而言之,更是立足于其“媒体”性质而观之。说他是“学者”,则基于其赋予《小说月报》研究功能的努力及日后成长的方向,他不遗余力提倡“整理旧文学”,且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作出过巨大贡献。其治学范式的形成,既有对国故整理方法的继承,又有他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新变,他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以编辑身份介入研究领域所伴生的“媒体”特色。

综观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名家,也许没有一个能如郑振铎般如此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如果说古代学术靠的是代代相传、其读者群仅限于“圈子之内”的话,现代媒体则完全改变了这种学术传播的方式:读者群从“圈内”向普通民众这个“圈外”转移,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亦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传播过程中与读者的互动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当然,有时也影响到了研究的独立性。

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设有“重要书籍介绍”栏目,最能体现出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倾向。每进入一项研究,他总是把搜罗到的资料目录做成“重要书籍介绍”公开发表,其发表目的在于“把最好的、最易购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介绍给平素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诸君”^①。自然,它既有指引读者研究门径的普及意识,又有希望同人补充商榷的期待。如他先后发表过《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关于俄国文学的重要书籍介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各国“文学史”介绍》等,每篇介绍对于罗列出来的书目版本与内容得失都有简单评述。这些书目以读者能见到的版本为尽可能的选择标准,读者对它颇为欢迎:

介绍书籍栏,对于某书的介绍,似嫌简略。此门最为我们所爱读,以后请对于某书的本身性质、外人批评、页数、价格等,特别注意。贵志似太偏重一些外国文学,我们纵然已得到将出《中国文学专号》的消息,可是这是系统的、批发的介绍,零碎的请莫忽过!^②

① 子汶(即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小说月报》,1924年第十五卷第一号。

② 徐文台来函,《通信》,《小说月报》,1923年第十四卷第十一号。

除了预告研究式的图书介绍,郑振铎还善于在“参考书目”中进行学术指引。以《文学大纲》为例,所列的参考书单,达897条!基本上以读者尽可能见到的版本为主,在可见的版本中尽量给出对比之后的精本,并加以简扼书评。虽然不至于像读者要求的那样连页数、价格都标注出来,但对其“本身性质”却是有个总体的把握。读者可据这份书单去对该领域作进一步的了解与研究。他偶评的“此书为最好的一部书”或“无特别的见解”等语,也是他自身读后的真实感受。这一普及学术的努力,正体现出他善为读者师的学者型编辑风度。

当然,《小说月报》的读者不仅仅是普通看客,还有很多关注研究的同仁,包括作者群。郑振铎引领风气的编辑艺术,主要就体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上。郑振铎刚发表过《读毛诗序》,接着就开始连载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同期的“读书杂记”则载有多则关于《诗经》的文字,可以说掀起了一个研究《诗经》的小高潮。读者亦不甘寂寞,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与见解,可于杂志之“通信栏”见之。再如他做《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刚载一期,即有读者来信指出其中的疑虑^①,接下来郑振铎即以长文解答读者如淦女士(冯沅君)的质疑等^②。在质疑与解答的过程中,作者与读者对学术问题的把握均一步步变得明晰。这种集众人智慧的探讨方式,后来被“古史辨派”学者发挥得淋漓尽致。

此外,郑振铎论文的语言风格也体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通俗化趋势。他并非不能做艰深晦涩的文言文(如他为藏书写的序跋绝大部分都是文言文),但因其目标读者群是《小说月报》的普通民众,所以,出于受众广泛的刊物性质,以及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运动需要,郑振铎立论力避艰深,引文却不辞琐碎。虽不免招来吴世昌的“抄书”之讥,却无碍他普及文学意图的实现。正如他在《小说月报·最后一页》中自我推荐《文学大纲》时所说的:

《文学大纲》的第六章,叙《印度的史诗》,马哈巴拉泰(今译摩诃婆罗多)与拉马耶那(今译罗摩衍那),也是极有趣味的,想读者

① 《关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两封通信》,《小说月报》,1924年第十五卷第二号。

② 郑振铎:《关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几则怀疑的解答》,《小说月报》,1924年第十五卷第三号,文章分别名为《读淦女士的〈淘沙〉》《覆王鉴君的信》《覆翦遂如刘承休诸君的信》。

听见他们的名的一定不少,但在中国,详细的介绍他们的内容的,恐怕只有这一篇了。^①

可见,在他看来,他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讲述故事中的内容,是因为这些作品中国读者很难见到,他有责任详细列出它们的主要内容。归根结底,他之所以“抄书”,乃是为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今天看来,郑振铎此间所发表的论文许多有着偏离学术语言的倾向,显得不够严谨。如《读毛诗序》未免过于主观,《中山狼故事之变异》和《螺壳中之女郎》不够规范,《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则太过粗糙……但是不可否认,郑振铎不但善于领时代风气之流,开拓自己的研究新领域,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赢得读者、引领风气的目的。

二、业余学者:独特的私人藏书者与学院外研究者

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郑振铎的专职工作是编辑,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说月报》总共才一个编辑,也就是说,从选题、组稿到编发,全是郑振铎一人包办^②。以《小说月报》每期的发稿量来看,这份工作不可谓不繁重。然而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古典文学研究,却硕果累累,并一度成为他工作的重心。短短四年里,《小说月报》共刊登中国文学研究论文138篇(包括书刊介绍),其中32篇来自郑振铎。另外还连载了近百万字的《文学大纲》!其研究范围之广泛、视野之开阔、材料之繁多,已不能仅仅以“业余学者”而概之了。

“整理国故”的研究者很多是高等院校的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他们有着浸染已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资源的使用便利,在学术界处于主流和前沿地位。郑振铎不一样,他的求学背景和工作环境,都表明他与正统规范之内的“研究系”相距甚远,以致当1931年他想从“业余”转为“专业”学者,还不太被学术圈所接纳^③。其研究成果,亦很少被学

①《小说月报·最后一页》,1924年第十五卷第五号。

②陈福康:《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编辑学刊》,1989年第2期第77-79页。

③1931年,为摆脱繁忙的编辑工作,专力从事《中国文学史》撰写,郑振铎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北上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但靳以后来回忆说:“那时他虽然在充当大学教授,实在是不被那些‘学者名流’所看重,他被当时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聘为教授,若以一个学校来说,他不过算半个教授,而这‘半个教授’还被那些‘正人君子’排挤得‘无以复加’,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上海去了。”参见靳以:《不是悲伤的时候——悼念郑振铎同志》,《文汇报》,1958年10月22日。

者认同或引用。但就是这个生存于学院之外的郑振铎,通过《小说月报》等媒介,走出一条独特的“业余学者”研究之路。考察他的这些论文,有时虽不免带有普及与通俗的痕迹,却无碍于他研究范式的形成:通过朋友讨论、书籍介绍、资料研究、论文撰写、丛书出版等步骤,郑振铎的研究成果与“学院派”相比毫不逊色,其勤奋与高瞻远瞩使他成长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郑振铎虽站在研究圈之外,却安身于出版社这一学术传播的中心,所交亦是治学颇有所得的专家学者。其研究兴趣的生发,往往正是由朋友间的漫谈引起,沿着兴趣顺藤摸瓜,一步步接近问题核心。他第一篇古典文学研究力作——《读毛诗序》,就显露出其资料翔实的特色,以至后来鲁迅都说他“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①。其实资料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每个学者都不例外。但郑振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总是把搜罗到的资料目录做成“重要书籍介绍”公开发表。虽然他并不是如孙楷第那样专注的小说目录学家,其论文却是以材料之富与搜罗之博见长,这对于一个基本只依靠自己的个人藏书来进行研究的业余者来说,是极为难得的。况且郑振铎的“孤本秘笈”从不秘不示人,往往很快就经由影印或点校出版或书报介绍变成了学术公器,珍籍出版,又往往是引领研究热潮的先声。

郑振铎撰写的论文,总是透着融汇中西的努力,西方文学原理是他的理论支撑,传统考证则是他实证的基础。其资料丰富的特色又决定了他治学亦以考证见长。他考证的步骤与胡适同中有异:胡适始终是以历史的立场,通过“祖孙”关系的确定从线性因果的趋势分析中寻找出一个文学演进的系统结论;郑振铎则是立足“文学”本位,强调以“统一”的眼光去观照所有的文学作品——打破孤立的片断研究,通过追本溯源与沟通文史来进行文学的整体研究。所以,胡适“更多的是在方法上确立学术研究的规范……缺乏对作品思想内蕴与艺术特色的发掘”^②。郑振铎紧随其后,虽然也是考察作品演化的过程,充分运用新的材料以及同仁考证的成果,但他以新文学创作与翻译直接参与者的切身体会,注重广泛地挖掘文学作品的社会学价值,比胡适的“历

^① 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② 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史演进法”更为贴近文学作品本身。

此外,郑振铎还善于以丛书出版组织者的身份,大力普及学术著作,使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迅速传播。当研究借助报刊与书籍的快速流通进行传播的时候,个人行为就加进了社会性、集体性的因素,这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观念的创新。对于一般学者来说,论文完成基本上就是研究的结果了。郑振铎作为编辑兼学者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作为学者最不一样的地方,即在于他不仅仅只是令一份文学刊物能够广受欢迎,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组织大型丛书的出版,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快速传播。在他的奔走组织下,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丛书、鉴赏丛书、大学丛书等相继面世,许多已成为商务版备受好评的图书品牌。郑振铎热心出版的目的是要促成更多同仁加入研究队伍,同时也更及时地将前沿成果推荐给广大读者:“这是我们的区区愿望,要在这里,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这面盾的真相显示给大家。”^①反观胡适通过与亚东图书馆合作,探索出一套整理古籍的程式,就与郑振铎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校勘、训诂、标点、分段,最后撰写考证性或评论性的序言。胡适已经认识到现代研究中集体智慧的力量,郑振铎则是把这种力量量化为成果的直接组织者。

通观郑振铎以《小说月报》为发表基地进行的古典文学研究(参见表1),赋其研究功能是他编辑艺术的理念物化,注重读者需求则是他身为编辑的本色体现。他充分认识到了现代媒体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作用,借助媒介,并利用其学术传播的新方式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式,使郑振铎以业余身份加入学者行列而形成独有的学术个性。

表1 《小说月报》郑振铎主编期间所刊研究论文篇目(1923.1—1927.6)

类 别	作者及篇名	所刊期数
评 论	郑振铎《读毛诗序》、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采取的态度》、王伯祥《国故的地位》、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玄珠(茅盾)《心理上的障碍》	1923(14:1)
	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1923(14:3)
	沈雁冰《中国神话的研究》、任伯涛《文艺底研究和鉴赏》、俞平伯《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陈乃乾《黄妃辨》	1925(16:1)
文学史	郑振铎《各国文学史介绍》	1925(16:1)
作家研究	西谛《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	1924(15:1-6,9)

① 郑振铎:《〈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卷头语》,《小说月报》,1927年号外。

续表

类 别	作者及篇名	所刊期数
	西谛《关于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几则怀疑的解答》	1924(15:3)
作品评介	敦易《红楼梦》	1924(15:9)
杂 文	许地山《中国文学所受的印度伊斯兰文学底影响》(通讯)	1925(16:7)
读书杂记	西谛《葬花词》《步韵诗》《李后主词》《纳兰容若》《曲录二则》《孔雀东南飞》, 颉刚《诗考》《读书杂记二则》, 予同《札记一则》	1923(14:1)
	西谛《唐诗》《郑厚》《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颉刚《诗津》《全本戏》《庄暗香》, 予同《渔父》《周易》《韩退之与卫退之》	1923(14:2)
	颉刚《刺诗》《及时雨》《铁冠图》《钱镠的歌》《刘晖吉女戏》, 西谛《李清照》	1923(14:3)
	颉刚《合生》《乐府》《硕人》, 调孚《诗序》, 予同《何与底》《史记南越尉佗传赞》, 西谛《玉函山房辑佚书》	1923(14:4)
	西谛《文赋》, 圣陶《诗与对仗》, 颉刚《金圣叹的势力》	1923(14:5)
	王伯祥《鸡鸣》	1923(14:6)
	颉刚《举子与才子》	1923(14:7)
	颉刚《旦儿》《恋爱戏》《古诗与乐歌》《元曲演奏的形式》	1923(14:8)
	颉刚《经与文的隔绝》《妒花歌的译文》	1923(14:10)
	严敦易《红楼梦》, 颉刚《郑樵对于歌词与故事的见解》	1923(14:11)
	颉刚《赠诗》《崔述硕人诗解》	1923(14:12)
	颉刚《老残游记之作者》, C.K《采桑娘》	1924(15:3)
	颉刚《诗与史》	1924(15:4)
	颉刚《秦腔》	1924(15:5)
	颉刚《楚词》《明清戏价》《官场现形记之作者》	1924(15:6)
	敦易《老爷的称谓》	1924(15:9)
	颉刚《双卿》	1924(15:11)
	颉刚《招魂与大招》	1925(16:6)
	王伯祥《四库全书述略》	1925(16:12)
书刊介绍	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	1923(14:1)
	西谛《几部词集》, 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1923(14:3)
	西谛《中国的戏曲集》	1923(14:4)
	西谛《中国的诗歌总集》	1923(14:5)
	西谛《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	1923(14:7)
专著、专辑	郑振铎《文学大纲》	1924—1927
其 他	《中国文学研究》(收论文 63 篇, 著者包括: 郑振铎、郭绍虞、唐钺、潘力山、朱湘、梁启超、俞平伯、陆侃如、刘大白、陈延杰、滕固、伍叔傥、徐嘉瑞、施章、台静农、张友仁、刘经庵、褚东郊、许地山、吴瞿安、张友鸾、谢康、汪馥泉、欧阳予倩、君左、谢无量、汪仲贤、严既澄、陈衍、卫礼贤、陈垣、许文玉、梁绳祯、胡梦华、丁文江、吴文祺、徐传霖、钟敬文)	1926(17:号外)

第二节 学者式藏书活动与收获

郑振铎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是他海量的个人藏书,其一生最被人称道的成就也是古籍的收藏与整理。早在北京求学期间,嗜书如命的他便借助一切可能的机会遍览群书,并初露藏书校勘家的潜质:

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常托家叔莲蓂先生向外交部劳务书馆借些古书来看。刘知己的《史通》便曾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工夫把它抄录下来。^①

至平就学,得见郑夹漈《通志二十略》,复手录其《校讎略》《艺文略》……又假得章实斋《文史通义》,亦心服其论。时牵于治他学,于斯仅间一涉猎而已。^②

郑振铎以积极推进新文学建设立足文坛,最早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学”的口号,他自己对古代文学研究也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尤其关注古代用通俗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前期发表的30余篇论文中,除两篇是关于《诗经》之外,其余全是古典小说戏曲或民间故事的研究。他的研究,均以最大限度占有资料为特色。郑振铎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东方图书馆及自己的个人收藏。一方面,192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宝山路新楼建东方图书馆,藏书51万册,为郑振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郑振铎每月60元的薪金及大量稿酬收入为他收藏古籍创造了经济条件^③。熟悉郑振铎的人,都知道他对书的狂热。郑振铎的购书藏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④。从《西谛书目》与其各种书目介绍,即可看出

①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初稿》,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② 郑振铎未刊残稿,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③ 郑尔康:《〈小说月报〉的变迁》,《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④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郑振铎全集》(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页。

其阅书之广。郑振铎善于将自己版本学和目录学的经验,运用到具体文本的研究当中,重视各版本间的异同与流变。关于运用目录与索引是他治学的重要基础及特色。

一、避走欧洲:遍阅珍籍

1927年5月,因“白色恐怖”加剧,郑振铎在亲友催促下,决定离开上海远避欧洲,将《小说月报》暂时交给徐调孚和叶圣陶代为编辑。虽是逃亡之旅,郑振铎仍念念不忘他的文学研究:

这次欧行,颇有一点小希望。(一)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学,作一种专心的正则的研究。(二)希望能在国外清静的环境里做几部久欲动手而迄今因上海环境的纷扰而未写的小说。(三)希望能走遍各国大图书馆,遍阅其中之奇书及中国所罕见的书籍,如小说、戏曲之类。^①

他没有食言,此次旅行,他创作小说和散文20多篇,译述希腊、罗马神话34篇,还接触到了国外前沿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理论,并通过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院查阅了大量罕见的中国古代俗文学资料。尤其是通俗小说与敦煌遗书,成为他回国后研究水平跃上新台阶的坚实基础,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地位。

作为藏书爱好者,郑振铎是非常关注域外所藏中国典籍的情况的。在国内时,他就非常遗憾不能得见藏于苏联列宁堡、荷兰莱顿和德国柏林、法兰克福等地的中国古籍^②,此次有机会出国,当然要尽力搜读藏于巴黎和伦敦的中国珍籍了:“此次欧行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注意的是小说与戏曲。”^③

1927年6月,郑振铎一抵达巴黎,就迫不及待地央朋友代写去国立图书馆看书的请求书,办妥长期阅览券。翻到“钞本阅览室”中国书

① 郑振铎:《欧行日记》,《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 郑振铎致董康信,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③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郑振铎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籍的目录,郑振铎喜不自禁,“史地,经子及文集,小说,戏曲的目录。这本目录,内有不少好书为我们所未见的,很想细细的阅读”^①。因这些国内已难见其踪的中国小说戏曲图书,本只想在巴黎小住几天,郑振铎最后逗留了三个月之久。其成果,主要体现于1927年11月发表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此前一年,胡适曾在伯希和亲自陪同下查阅过这里的敦煌文献^②,他当时关注的是关于禅宗史的材料,郑振铎同样翻阅了敦煌石室手卷及钞本书的目录,借阅过《太子五更转》等变文,只是因为其中“重要的中国小说及戏曲极少”,所以他未多加注意。尽管如此,作为公开发表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珍籍书目提要,这还是比王重民、向达1934年奉北平图书馆之命搜集整理敦煌文献早了好几年。

《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分四个类别,详细记载了国内罕见的25种长篇小说、7种短篇小说、6种传奇、4种唱本。当然,这远远不是巴黎图书馆馆藏的全部,只是“就我的见闻所及,兴趣所在,把其中我个人认为罕见的或可注意的、可资研究的小说及戏曲,列举于下”,“预料发表后,当可引起许多人的研究与讨论”^③。他不仅仅是列举,而是参照他以前见过的同名小说或戏曲版本择要介绍。这些材料,正是他日后做《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小说研究的重要参考。

1927年9月下旬,在巴黎创作了10篇小说、8篇散文,并收获了1篇重要论文之后,郑振铎前往伦敦,开始了大英博物馆的访书之旅。在这里,他每天除了抄“变文”、研究小说戏曲之外,还接触到了弗雷泽、柯克士等人的人类学、民俗学理论,且对其大感兴趣:“手头恰有一部J.G.Frazer译注的Apollodorus的‘The Library’,便常常的翻翻。每翻一次,便多一次为他的渊博无伦的注解所迷醉了。”^④郑振铎的“翻翻”很有成效,他立即将此理论运用于中国古史的习俗研究,并依此写出了古史探索式论文《释讳篇》,回国后又相继撰成《汤祷篇》《玄鸟篇》《黄鸟篇》《伐檀篇》等。据说,他因非常服膺弗雷泽的理论,曾有翻译

① 郑振铎:《欧行日记》,《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③ 郑振铎:《欧行日记》,《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④ 郑振铎:《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叙言》,《郑振铎全集》(第十八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